

特大城市外来农民工的生存 状态与融入倾向 ——基于上海抽样调查的观察和分析

陆康强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基于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外来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和生存状况;通过构造城市融入指数,测量、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倾向。最后提出三点值得注意的调查发现:即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规模在缩减;农民工的年龄有趋大之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两大现实体制障碍。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阶层;城市融合;融合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3-0065-13

一、导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一般界定为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力人口。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4亿人,约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1/4。这个庞大人群所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建设、推进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但是,诚如许多文献所指出,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其实是一个职业与身份不一致的群体(咎剑森,2004;唐正秋,2007)。正因为如此,在就业、子女教育、劳动工资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农民工的利益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从而引发种种矛盾和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上海是我国东部工业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兴起归因于移民贡献,上海近30年来的经济开发又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建设者和创业者,其中农民工是规模最大的人口群体。根据上海统计局推算,2007年沪上外来农民工人数为403万人,占当年上海常住人口1/5强。由于身份的同质性,又因为人口学特征及所处环境的差异性,上海的农民工和农民工问题既

收稿日期:2010-0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08JZD0024)

作者简介:陆康强(1956—),男,上海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有和全国情况相似之处,也有本地的表现特点。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2009年9月合作开展了“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旨在通过科学观察,了解沪上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诉求,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提供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以在沪就业的外来农民工为对象,按照分段、分层和随机(起点)等距相结合的抽样方案,在全市范围共抽取农民工1545人,由调查员当面进行问卷征询。经审核,1446人应答有效。其中,男性876人,占60.6%;女性570人,占39.4%。下面本文试依据这个样本,概述上海外来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分析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和融入状况,并通过构造融合指数,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倾向。最后,本文将结合有关数据,提出值得注意的调查发现。

二、人口学特征:结构与分布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上海外地迁入人口最多的五大省份是:安徽(30.5%)、江苏(19.3%)、四川(7.6%)、河南(6.4%)和浙江(6.3%)。本次调查显示,目前沪上农民工人数占比居前的也是以上五个省。其中,安徽占27.0%、江苏占20.5%、四川占9.5%、河南占7.5%、浙江占6.8%。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看,空间距离显然是影响农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其表现是:沪上农民工的65.9%来自华东六省,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以及西南的云南和贵州,合计对沪上农民工的规模贡献还不到5%。

(一)年龄。调查显示,沪上农民工的年龄均值为32.5岁;其中男性33.8岁,女性30.5岁。与此相应,26.4%的农民工不到25岁,59.3%不到35岁,77.3%不到40岁。这种正偏态的年龄分布为男、女农民工所共有,但后一群体的偏态更明显,表现为女性农民工的35.1%集中在25岁以下年龄段,只有5.4%的人年龄超过45岁。

(二)文化程度。我国城乡二元格局下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曾经是导致农民工被标签为低文化素质群体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反映在调查中,虽然总的来说,外来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低于上海本地就业者,但农民工内部文化程度“青出于蓝”的迹象较为明显:如在35岁以下年龄段,有32.9%的人接受过高中/中专教育,并有16.7%的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两个比例分别高于3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18.5%和1.7%。在25岁以下年龄段,具有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更多,分别占到40.5%和18.6%。

(三)婚姻状况。沪上农民工的70.8%为已婚者;男性和女性已婚率分别为74.8%和64.7%。已婚农民工男性平均年龄为36.8岁,高出女性1.9岁。目前,至少有1/5的已婚者独自一人在沪生活,其中男性占90.9%,平均年龄

38.5岁;女性占9.1%,平均年龄33.6岁。

(四)行业—职业。沪上外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43.4%)和建筑业(18.5%);就业于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则以批发零售业(13.8%)和商务服务业(12.8%)居多,其余是住宿餐饮业(4.8%)、居民服务业(4.4%)和运输业(2.4%)。如果以“当前主要从事的工作种类”为职业,沪上72%的农民工都属生产服务人员,主要从事传统型、操作型、体力型的简单劳动。其中68.4%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于初中。教育对职业的影响同样可见于农民工群体。

(五)居留地。沪上农民工目前虽然遍布全市各区、县,但总体呈现中心城区少、城乡结合部多的空间分布特征:黄浦(3.1%)、卢湾(3.2%)、徐汇(4.8%)、长宁(3.1%)、静安(4.6%)、普陀(3.1%)、闸北(2.4%)、虹口(4.1%)、杨浦(4.4%)等九个老城区的农民工合计只占32.8%,还没有浦东(12.9%)、闵行(12.9%)、嘉定(8.4%)三个区的农民工多。这种情况显然与上海制造业向开发区集中,市政建设和居民区开发向近郊扩散,从而就业机会随之转移有关系;因为沪上农民工主要就业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根据上海统计局的统计,^①浦东(14.4%)、闵行(12.2%)和嘉定(12.7%)正是沪上工业企业集中的三个区。

三、工作状况:就业与待遇

从依附土地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劳动者,对农民而言,这是初次职业流动;在社会学中,被视为可使农民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层次社会的流动。农民工无疑都有初次职业流动的经历,其中相当部分更发生了职业再流动。下面根据调查数据,从职业流动、就业途径、劳动保障、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方面,观察沪上农民工的工作状况。

(一)职业流动。调查显示,沪上农民工近三成在20岁之前发生初次职业流动,近六成在25岁之前成为农民工。从个人层面看,改善生存处境是农民工来沪打工的一致动因,但在首要动因上又有明确和模糊之分:明确者首先出自“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的考虑,他们人数居多,占44.7%;模糊者似无职业追求,要么以“挣生活费”(32.9%)或“做城里人”(1.7%)为初衷;要么因为“家乡没活干”(11.9%)或者“务农太辛苦”(7.7%)。

再看农民工的职业再流动。截至调查,农民工平均来沪7.2年;从事现职平均时间为4.5年,占平均来沪年数的62.5%。其中,来沪后未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占30.1%,换过1份工作的人占46.9%,换过2—4份工作的占20.6%,换过5份及以上工作的占2.3%。综合看,69.8%的沪上农民工发生过职业再流动,且10人之中至少有2.3人变换工作不止一次。但统计显示,农民工换工与否和换工频度都未导致工资收入的显著增加($p>0.05$)。这反映,沪上农民工的职业再流动也带有李强(1999)、周运清等(2002)等的早前发现的水平化特征。

(二)就业途径。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大致有四种:其一是直接在劳务市场获

得工作,谓之自助就业;其二是依靠亲戚朋友获得工作,谓之友情就业;其三是经政府部门介绍获得工作,谓之公助就业;再有是通过中介机构获得工作,谓之中介就业。调查显示,在来沪农民工中,友情就业占 50.9%,自助就业占 33.1%,中介就业占 13.9%,公助就业只占 2.1%。可见,友情就业是沪上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途径。有证据表明,全国情况大同小异。^② 由于友情就业依托的是以人群内部的亲密感、信任感和义务感为基础的强关系,而强关系的关系者之间通常有很高的社会属性的同质性,容易形成彼此复制和相对封闭的人际网络,所以会妨碍个人弱关系的培育,限制个人社会发展的空间。格拉诺维特等学者曾发现,当人们利用个人网络求职时,强关系通常不如弱关系能经常而有效地帮助获得合适的好工作。由此,对于“工作更经常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的”。(边燕杰,1997)农民工之所以职业流动呈水平化的原因,可以提供一种解释。

(三)劳动保障。劳动保障可见之于劳动关系、薪酬支付两个方面。调查显示,沪上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 劳动合同签约率较高。86.7%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有为期不同的劳动合同。其中,合同期不定的占 9.9%,合同期在 1 年及以上的占 83.9%,合同期在 1 年以下的占 6.2%。

2. 薪酬支付较正常。约九成的农民工能按时领取工资,只有 2%的人明确表示“不能按时兑现工资”。这反映,在社会、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干预下,曾经多见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虽然尚未绝迹,但似已少见沪上。

(四)劳动时间。沪上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5.6 天,每天工作 8.8 小时,均超过国家法定的劳动时间标准。其中,每周工作超过 5 天的占 49.9%,每天工作超过 8 小时的占 33.3%,更有 11.6%的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表 1

表 1 行业、职业、合同类型的工作时间排序

行 业		职 业		合同类型	
周工作天数	日工作时数	周工作天数	日工作时数	周工作天数	日工作时数
建筑业 (6.0)	居民服务业 (10.6)	个体经营 (6.6)	个体经营 (10.7)	自营 (6.7)	自营 (10.8)
批发零售业 (6.0)	批发零售业 (9.7)	生产/运输工 (5.6)	其他职业 (10.0)	无合同 (6.2)	无合同 (9.9)
居民服务业 (5.9)	运输业 (8.9)	商/服人员 (5.6)	商/服人员 (9.2)	无固定期限 (6.0)	其他 (9.4)
运输业 (5.8)	建筑业 (8.7)	其他职业 (5.6)	生产/运输工 (8.7)	其他 (5.9)	无固定期限 (9.2)
住宿餐饮业 (5.6)	商务服务业 (8.7)	管理人员 (5.5)	管理人员 (8.5)	一年以下 (5.6)	一年以下 (8.7)
制造业 (5.4)	制造业 (8.6)	办事人员 (5.3)	办事人员 (8.4)	一年及以上 (5.5)	一年及以上 (8.6)
商务服务业 (5.2)	住宿餐饮业 (8.5)	—	—	—	—
F=30.265 df=6 p<0.001	F=20.457 df=6 p<0.001	F=27.154 df=5 p<0.000	F=23.522 df=5 p<0.001	F=42.714 df=5 p<0.001	F=22.325 df=5 p<0.001

数据来源:本次调查(下表同)。

显示,上班时间除有行业或职业特点外,还与农民工的合同情况有关系,表现为无合同的上班时间比有合同的长;合同期长的上班时间比合同期短或合同期不定的长。这反映出,在缺少劳动合同约束或者劳动关系稳定性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更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

(五)劳动报酬。根据上海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 502元,折合月均3 292元。本次调查显示,2009年沪上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为2 009元,与上海职工同年的人均月薪相比,要低39.0%。从分布看,一半农民工工资不到1 800元,不分组计算的工资基尼系数为0.23。这表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不大。不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仍有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性:在年龄上,25—35岁组最高(2 176元),55岁及以上组最低(1 609元)($p < 0.001$);在性别上,男性(2 178元)高,女性(1 750元)低($p < 0.001$);在文化程度上,大专及以上(2 555元)高于高中/中专(2 052元)、初中(1 925元)和小学及以下组(1 792元)($p < 0.001$);在行业上,运输业最高(2 939元),住宿餐饮业最低(1 427元)($p < 0.001$);在职业上,个体经营最高(2 781元)、管理人员次之(2 667元),商业服务人员最低(1 699元)($p < 0.001$)。

统计还显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工作时间、任职年数只有极弱的相关性;方差分析没能检出工作时间和任职年数对工资收入的显著影响($p > 0.05$)。这反映: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很少甚或没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很少甚或没能随工作经历的增加而增加。可以说,在劳动报酬的决定上,农民工普遍还是被动和无奈的一方。

四、生活情形:态度与习惯

沪上农民工的24.7%来自20世纪90年代,更早来沪的只占3.4%,余下71.9%的人都是21世纪来沪的,其中近两年来沪的占18.1%。按常规人口统计口径,96%的农民工已属上海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的生活消费、子女教育、就医取向、业余生活,通常是考虑市政、生活设施建设和拟定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所以是值得关注的各项。

(一)生活消费。毋庸讳言,无论是基于职业地位(仇立平,2001;陆学艺,2006),还是基于权利、资本掌握程度(刘欣,2007),在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民工都属底层群体,他们的生活开支主要以最基本的日常消费为内容。

目前沪上农民工的月消费开支按“户”统计为1 398元;按人统计为667元。以单人户为代表,农民工的收支比为0.45。其中,10%的人收支比不到20%,60%的人收支比不到50%,支出大于收入者只占2.4%。可见面对上海的生活成本,大多数农民工只能选择节俭度日。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平均为:食品占46.5%,医疗费用占4.6%,水、电、煤占6.6%,房租占17.8%,交通、通讯占9.0%,子女教育占5.4%,其他开支占9.9%。如果以恩格尔系数为量

度,显见沪上农民工生活水平的集中趋势介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中,超过 28.0%的农民工因为恩格尔系数超过 0.6,还处在统计上的“贫穷状态”。

(二)居住形式。农民工在职业上的流动性,加之经济支付能力的有限性,一方面使他们成为城市中居住最不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居住条件普遍采取将就态度。调查显示,在农民工的居住形式中,除了独自租房(41.3%)与合租住房(16%)外,比较多见的是单位宿舍(27.6%),此外还有工作场所(8.3%)及其他形式(6.7%)。截至调查,农民工在现住处居住未满 1 年的占 24.1%,已居住 1—2 年的占 28.7%,居住 3—4 年的占 15.9%;平均居住时间为 2.8 年。大约 3/4 的农民工来沪后至少换过一次住处。

(三)就医选择。可能正值青壮年,91.6%的农民工都自认身体“健康”;一半人在过去九个月里没有上医院看过病。不过,没上过医院并不代表不曾患过病,因为 72.1%的农民工在这九个月都有医疗费用支出,人均花费为 65 元/月。调查显示,“小病自己买药吃”是 73.7%的农民工的就医选择,只有不到 1/4 的人“有病上医院”。当然,真有病而“挺着不看”的人毕竟也很少,只占 1.7%。

目前,农民工的综合保险参保率为 82.7%,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参保率为 39%。统计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与就医选择无显著关系($p > 0.05$);而就医的方便性也不是农民工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因为 94.4%的农民工没有感觉在沪就医不方便。至于经济条件,方差分析显示:农民工工资对就医选择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民工的就医取向呢?我们认为,除了可能但无法获证于本次调查的农村就医习惯外,更多可能是农民工已加入的社会保险还不能满足日常医疗保障之需。可作为间接印证的是:在农民工“最迫切需要得到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医疗保障”高居榜首,其认同率达到 80.3%。可见,农民工轻易不上医院是另有原因的,而“医疗保障”缺失应是要因所在。

(四)子女教育。或许来自学历社会的影响,也可能鉴于自己的经历或阅历,农民工显然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重复自己。反映在调查中,86.7%的农民工都希望其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目前,有 12.2%的农民工至少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沪上学;这些孩子平均年龄 11.1 岁,其中 58.5%为小学生,25.4%是中学生;62.9%就读于公办学校,另有 21.5%就读于民办学校,15.1%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由调查数据估计,时下农民工子女在沪就读一年需要支付的学杂费约为人均 1 904 元;此外,每个孩子平均每月还有 290 元的其他教育开支,因此,有 21.6%的农民工将子女教育视为在沪生活的最大困难。

(五)业余生活。“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别”(仇立平,2001),而业余生活则是观察阶层生活方式的主要角度。调查显示,在目前沪上农民工的三项主要业余生活榜单中,居首位的是“看电视、听广播”(84.6%),其余依次为“看报纸、看书”(33.1%)、“睡觉打发时间”

(27.7%)、“陪伴家人”(26.9%)、“上网”(26.3%)、“逛街游玩”(26.0%)、“教育孩子”(11.5%)、“喝酒聊天”(10.4%)、“学习、培训”(10.1%)、“打牌打麻将”(8.4%)及“其他”(3.1%)。不难看出,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带有消遣多、学习少,自娱多、花费少,圈内多、社交少的特点。

五、城市融合:倾向与测量

农民工是嵌入城市结构,又游离于城市社会主流的特殊群体。作为嵌入者,农民工既会造成对城市结构的挤压,也会遭受城市结构的排斥;作为游离者,农民工虽然已是城市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在城市缺乏社会关系,缺乏社会约束和保护,城市市民在教育、卫生、劳动、养老等方面享有的待遇很少为他们所共享。然则,按照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农村劳动力占全民劳动力比例的低水平,以及农民占总人口比例的低水平,是现代成熟经济体的基本标识(亨廷顿,1988),所以,农民工为城市所接纳,应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给予农民工以公平的市民待遇,帮助他们由城市嵌入者、游离者转变为城市融入者,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保证。这里试从融入条件、融入意愿和融入迹象三个侧面梳理、整合调查数据,测量目前沪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倾向度。

(一)融入条件。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在城市要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同时要有栖身之处。有职业可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以形成与城市居民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能与后者发生社会交往,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田凯,1996);有居所才能在城市立足,满足生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本次调查中,沪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条件可间接察之以下调查反应:

1. 就业条件满意度。能否找到工作,劳动保障如何,有无职业培训,这是农民工评价就业条件好坏的重要依据。在调查中,66.8%的农民工对就业条件表示满意。但同时,分别有19.7%和10.4%的人认为在“劳动保障”和“就业机会”上存在明显不公平;还有至少三成的人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有43.1%的人深感缺乏劳动技能培训。总的来看,农民工在上海有就业机会,但缺少职业发展机会。

2. 收入条件满意度。沪上农民工平均月薪2009元、相当于本地职工工资收入的六成水平。对收入现状,调查中虽有4.5%的人表示“非常满意”,还有30.1%的人认为“比较满意”,但46.6%的人感觉“一般”,不满意者占18.8%。从调查看,农民工在收入上有明显的不公平感;33.3%的人将“工资收入”列为最渴望的公平待遇。如果将认为“工资太低”(6.5%)、“城市生活开销大”(51.2%)和“收不抵支”(2.9%)的人加起来,约六成农民工有收入拮据感。

3. 居住条件满意度。沪上农民工大多置身简陋、逼仄的居住环境;将就是常见于这一群体的居住状况。在调查中,农民工群体对居住条件的满意度明显以“一般”为众数(45.0%);虽然也有7.3%的“很满意”者和36.2%的“比

较满意”者。其实,从城市融合的角度看,居住形式更能反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条件,因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形式主要有两种,即群居型和散居型。与散居相比,群居的社交圈子相对封闭,缺少和城市主流文化及本地居民交往互动的机会,因而不利于农民工摆脱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村落传统和小农意识,会妨碍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归属。从本次调查看,居住形式明显属于群居型的农民工至少有 35.9%,他们主要以单位宿舍或工作场所为住处。

(二)融入意愿。农民工要融入城市,除了具备经济条件,还需要有主观意愿。条件是融入城市的物质基础,而主观意愿则会影响融入城市的形式和效果。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融入意愿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 来沪动因。如前所述,在农民工来沪的首要动因上,既有因“家乡没活干”、“务农太辛苦”的,有为“挣生活费”的,也有为“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为“做城里人”的。相对而言,首要动因为最后两种的人,融入意愿比较明显和主动。他们的人数将近农民工的一半。

2. 未来去向。身在上海,随着城市经历增加,农民工对未来的设想将比来沪之前更实际。从调查看,除了 30.1%的人不愿公开或尚无计划,36.3%的人还是打算“有钱后返乡生活”,还有 10.7%的人想“学好技术去其他地方发展”。明确打算“在上海安家立业”的人还不多,只占农民工的 1/5。

(三)融入迹象。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经历从熟悉、适应到属于环境的转变。下面几点可作为判识沪上农民工城市融入迹象的线索:

1. 来沪年数。时间是人们适应环境程度的有效表征。通常而言,农民工进城越久,意味着对城市社会规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了解越多,在城市立足的能力越强,从而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也越大。

目前沪上农民工的平均来沪时间为 7.2 年,其中来沪超过 10 年的占 24.2%。若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只以时间为量度,来沪年数相同而年龄不同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的倾向或能力未必一样。数据显示,在沪上农民工群体中,来沪年数为自然年龄 1/5 以上的人占 43.8%,为 1/4 以上的人占 31.5%。平均而言,沪上农民工们迄今已将 22.2%的生命时间放在上海度过。

2. 方言掌握。语言是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工具;而方言通常被用作衡量外来人口本地化程度的一个标准(刘玲,2001)。在本次调查中,53.2%的农民工表示能听懂但不会讲沪语,13.3%的人已达到能听会说沪语的程度,也有 33.5%的人目前还不懂沪语。统计显示,农民工来沪时间与沪语能力成正比,表现在平均来沪时间上:不会沪语者为 4.7 年;能听不会说沪语者为 7.5 年;能听会说者为 12.1 年。统计还显示,沪语能力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取向($p < 0.00$),一般地,沪语较熟练的农民工平时更乐意和本地居民打交道。

3. 交往对象。改变以亲缘、地缘为主的村落社交模式,适应以业缘、友缘为特点的城市社交网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标志。不过调查显示,近六

成的农民工目前虽然身居沪上,但仍乐意与老乡打交道;只有 9.8%的人乐意与本地居民交往。另外,老乡、家人仍是 46.4%的农民工在沪碰到生活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只有 2.1%的人会找上海朋友帮忙解困。

4. 在沪家人。62.7%的农民工目前和家人一起在沪生活,其中 84.5%为已婚者,有子女在沪就读中小学的约占 1/5。农民工是单身在沪还是有家属随同,这与其来沪时间长短有关,也可一定程度地反映其城市生存和融入能力,因为通常只有当其能在上海立足时,家人才会前来一同生活。

5. 心理归属。从环境适应、观念认同到心理归属,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般过程。农民工是否适应城市环境首先反映在他们对城市工作环境的感受上。在调查中,91.8%的农民工表示“能适应现在单位的管理制度”,只有 3.9%的人将“工作太辛苦”作为“在上海生活的最大障碍或困难”。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观念的认同情况也有迹可循。譬如,尽管分别有 59.5%和 20.5%的农民工平时习惯与老乡或外地工友交往,有 46.4%的农民工在上海遭遇生活困难时的首先求助对象是家人和老乡,但当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时,只有 6.3%的人会“求助亲友”,7.4%的人会“自己忍了”,大多数人采取的都是城市公民社会常见的维权途径,如“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35.3%)、寻求法律援助(38.6%)或“向有关部门举报”(11.3%)。

在调查中,农民工对上海的心理归属直接流露在他们对上海的评价中。从数据看,农民工对上海的总体满意率为 70.7%;有 26.3%的人认为“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27.9%的人认为“上海是可以实现我理想的地方”。但同时,也有 28.0%的人对上海评价“一般”;37.3%的人认为“上海不过是我打工谋生的地方”;7.7%的人认为“我是上海的过客而已”。

(四)融入倾向

1. 指数构造。基于上述三个方面,这里试构造一个测量沪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倾向度的综合指数。在结构上,该指数包括三个向度,分别对应于融入条件、融入意愿和融入迹象,谓之条件指数、意愿指数和迹象指数。向度指数的测点萃取以重要性、代表性和区分度为原则;向度指数与综合指数的算法则以简易性、灵敏性和标准化为取向。条件指数的算式为:

$$Y_{1i} = \frac{1}{3} \left\{ \min \left(\sqrt{\frac{x_i}{\bar{X}}} \left(\frac{2s_{1i}-1}{2k} \right), 1 \right) + \sqrt{b_i \left(\frac{2s_{2i}-1}{6k} \right) + \left(\frac{2s_{3i}-1}{2k} \right)} \right\} \quad (1)$$

其中: i 为个案号; x_i 为农民工月薪; $\bar{X}$ 为上海职工平均月薪(取 2008 年数字 3 292 元); b_i 为居住类型,设群居(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1,散居(租房及其他)=2; s_{1i} 为工资收入满意度; s_{2i} 为居住条件满意度; s_{3i} 为就业条件满意度; k 为五级满意度,设“很不满意”=1,“非常满意”=5。

意愿指数的算式为:

$$Y_{2i} = (w_{1i} + w_{2i} + w_{3i} + 6f_i) / 12 \quad (2)$$

其中： w_{1i} 为来沪工作首要动因，设“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与“做城里人”=3，其他=0； w_{2i} 为来沪次要动因，设“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与“做城里人”=2，其他=0； w_{3i} 为来沪第三动因，设“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与“做城里人”=1，其他=0； f_i 为农民工的未来计划，设“在上海安家立业”=1，其他=0。

迹象指数的算式为：

$$Y_{3i} = (c_i + l_i + o_i + p_i + 4t_i / a_i) \quad (3)$$

其中： c_i 为平时乐意打交道的人，设“上海人”=1，其他=0； l_i 为沪语能力，设“不会”=0，其他=1； o_i 为归属感，设“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和“上海是可以实现我理想的地方”=1，其他=0； p_i 为在沪一起生活的家人数，设“无”=0，其他=1； t_i 为农民工来沪年数； a_i 为农民工目前年龄。

鉴于向度指数可能为零，融合指数采用算术平均复合法：

$$R_i = (Y_{1i} + Y_{2i} + Y_{3i}) / 3 \quad (4)$$

其优点是计算简单、数据可适性强；缺点是带有数值替补性，鉴别力稍逊于几何平均法和调和平均法。

2. 测量结果。将上列各式用于调查数据的计算可知：在最低为0、最高为1的程度范围内，沪上农民工目前的城市融入倾向在条件上接近对称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在0.56以上；在意愿指数上呈明显正偏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不到0.25；在迹象指数上也呈正偏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不到0.34。综合三者，沪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指数呈正偏分布，一半人的倾向度不到0.37，总倾向度为0.39，处在较低水平。

以融入指数为应变量，对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文化程度、行业及职业作回归分析，得到线性方程如表2所示。

表2 农民工城市融入倾向对人口学特征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显著性水平	VIF
	B	SE	Beta			
常数	0.533	0.019		27.738	0.000	
A: 年龄	-0.002	0.000	-0.118	-3.561	0.000	1.797
G: 男性=1	0.002	0.007	0.008	0.292	0.770	1.114
M: 已婚=1	0.068	0.009	0.242	7.553	0.000	1.685
E ₁ : 小学及以下=1	-0.089	0.015	-0.233	-5.933	0.000	2.531
E ₂ : 初中=1	-0.053	0.012	-0.207	-4.419	0.000	3.623
E ₃ : 高中/中专=1	-0.028	0.012	-0.097	-2.317	0.021	2.859
B: 制造/建筑业=1	-0.018	0.009	-0.067	-2.016	0.044	1.813
O ₁ : 生产/运输工人=1	-0.090	0.012	-0.350	-7.656	0.000	3.432
O ₂ : 商业/服务人员	-0.089	0.013	-0.275	-6.219	0.000	3.274
O ₃ : 办事人员	-0.042	0.014	-0.099	-2.868	0.004	2.011
O ₄ : 个体经营及其他	-0.065	0.015	-0.192	-5.819	0.000	1.825

注： $R^2=0.128$ ， $F=19.146$ ， $df=11$ ， $p<0.001$ 。

标准化回归系数提示：农民工的人口社会特征比自然特征更能影响其城市融入倾向；尤其是，较低的文化程度和较低的职业地位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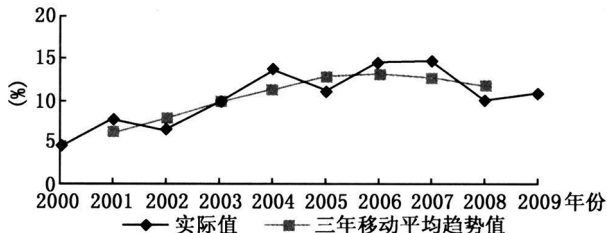
倾向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鉴于职业地位通常受制于文化程度,就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而言,提高农民工文化程度的人口统计学意义很明显。

六、总结与问题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一直是外来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上海外来农民工来源地广,但以来自华东地区和河南、四川两省的农民工为主体,他们在上海的空间分布与上海城市形态、产业布局和本地人口再分布的趋势相一致,呈现中心城区少、经济开发区和城乡结合部多的居留特征。和全国情况一样,沪上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众数,主要就业于制造、建筑和商业服务性行业,绝大多数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从事传统型、操作型、体力型的简单劳动。他们工作时间长,且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超时工作现象;他们职业流动多,但基本上以职业间的水平流动为局限。在物质生活上,或许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或许因为缺少失业、养老、最低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从而对未来心存忧虑,沪上农民工大多采取将就式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普遍处在温饱层次。在精神生活方面,作为经济、社会地位上相对弱势的阶层,面对迥异于农村的城市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农民工表现出“外来者”的隔膜感;而简陋和相对集中的居住环境,超时、超强的体力劳动以及自身文化素质的欠缺也制约着农民工业余生活的空间和形式,所以整体上,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不丰富,而且显得比较封闭;他们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基于现实条件,他们融入城市的倾向并不强。

此外,尚有三点调查发现值得一提和注意:

第一,农民工流入规模有缩减迹象。如果将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那么这部分人在沪上已不多,只占不到 4%。目前沪上农民工的 24.7% 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其余 71.9% 的人都是 2000 年以来流入的,而其中近六成又是近五年流入的。图 1 是过去 9 年农民工来沪人数的年度比例,从中可见,农民工的流入规模在 2007 年达到高峰,此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缩减趋势。在背景上,这应该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系。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又如何应对可能由此造成的上海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数据来源:本次调查。其中 2009 年来沪农民工按当年前九个月来沪人数等比折算。

图 1 上海农民工的年度流入比例

第二,农民工年龄

有趋大之势。以 10 年为一个出生队列,沪上农民工的 32.7% 为 60 后, 20.1% 为 70 后, 39.3% 为 80 后;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2.5 岁。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 2004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28.6 岁。如果这个年龄对当时的上海具有代表性, 那么与此相比, 近 5 年来沪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 3.9 岁。表 3 是按 10 年队列

表 3 不同年代农民工平均来沪时间

(单位: 岁; 系数)

	平均来沪年龄	标准差	标准差
20 世纪 80 年代	20.0	6.6	0.33
20 世纪 90 年代	24.2	6.9	0.29
21 世纪以来	26.0	8.3	0.32
合 计	25.4	8.0	0.31

统计的农民工平均来沪年龄, 它显示, 在过去三个 10 年中, 农民工来沪年龄变异相当, 但平均水平在提高, 这应该是导致沪上农民工平均

年龄趋大的重要原因。而不管这种趋势是否继续, 以沪上农民工目前的年龄结构, 都会有相当部分农民工接近或步入退休年龄。2009 年 2 月,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出台《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但该《办法》所针对的是“在城镇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而从本次调查可知, 上海还存在相当比例无合同保障的农民工, 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应如何解决? 还有, 即使是农民合同工, 如果所在单位不履行其承担的农民工养老缴费义务, 又有什么制度或措施可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这些问题也有待研究和回答。

第三, 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体制障碍。农民工问题归根到底,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从调查看, 沪上农民工普遍存在不公平感, 惟各人境遇不尽相同, 不公平感的指向也有所不同: 从农民工“目前最渴望的公平待遇”看,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公平感最集中, 占 33.3%, 其余分别是劳动保障 (19.7%)、医疗保障 (15.1%)、子女教育 (15.0%)、就业机会 (10.4%) 和职业培训 (5.1%)。

调查显示, 农民工在来沪初期, 较多感觉的是就业和职业培训机会的不公平; 在找到工作后, 不公平感转向工资收入与劳动保障; 而随着在沪生活时间增加, 则会关注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的不公平 (见图 2)。前文提及, 目前沪上农民工来沪平均已有 7.2 年, 这其中, 来沪 8 年及以上的人占 35%, 有 18 岁以下孩子的人占 54.5%, 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人占 22.5%。由此推测, 假如其他情况不变, 那么随着有子女教育和医疗需求的农民工增加, 相应的公平诉求

也会增加或趋强。鉴于教育和医疗保障作为每个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发展权, 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前提和保证, 也由于我国农民工迄今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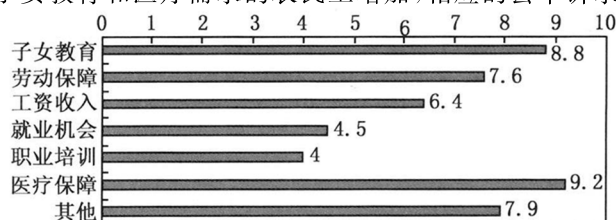


图 2 农民工来沪时间 (年数) 和公平诉求

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不能享受公平待遇的根源在体制,其解决的关键也在体制,所以,如何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在公平、公正、合情、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相关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当务之本。否则,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恐怕只能停留在空谈上。

注释:

①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农民工就业途径为:熟人或亲友介绍占 60.37%,中介机构介绍占 14.2%,自己应聘占 12.1%。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田凯.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J].人口学刊,1996,(4):4—7.

[3]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

[4]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标器[J].社会学研究,2001,(3):18—33.

[5]刘玲.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6]周运清等.农民工进城方式选择及职业流动特点研究[J].青年研究,2002,(9):44—49.

[7]曾剑森.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的双重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3):64—66.

[8]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23(5):28—35.

[9]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J].社会学研究,2007,(6):1—14.

[10]唐正秋.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4):49—51.

Living Status and Integration Tendencies of Migrant Peasant Workers in the Metropolises: An Analysis of a Survey in Shanghai

LU Kang-qi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in Shanghai,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living status of migrant peasant workers as well as their integration tendencies in Shanghai through constructing a composite index. The paper presents three findings worthy of mention, including size reduction and age increase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wo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for their integration into Shanghai, that is to say,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curity.

Key words: peasant worker; social class; urban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index

(责任编辑 许 柏)